

中国近代文学丛书

冯海荣 选注

丘逢甲詩選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

（清）王士禛

丘遲甲詩選



上海圖書館藏

中国近代文学丛书

顾 问

施蛰存 陈旭麓

丘逢甲詩選

冯海荣 选注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(沪)新登字第201号

丘逢甲诗选

冯海荣 选注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; 插页1 字数: 160千字

1992年12月第一版

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00 本

ISBN 7-5617-0917-8/H·068 定价: 6.05 元

《中国近代文学丛书》

已出书

魏 源诗文选

黄遵宪诗选

林 纾诗文选

梁启超诗文选

梅曾亮诗文选

近代短篇小说选

张维屏诗文选



责任编辑：姜汉椿
胡 铮

封面题词：范韧庵

封面设计：黄惠敏





总 序

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，是社会的转形期，与时代、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也处在由旧形态向新形态转化的过程中。但我国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，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，一向比较薄弱，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形成一个低谷。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兴盛的古典文学到了近代已趋衰微，适应时代生活要求的新文学又还未能脱颖而出，以其无可观而遂被忽视了。其实就事物的“变”与“常”的关系来说，转形期的近代文学比常态的持久的古典文学更需要研究。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改变，有的大学已经开设了中国近代文学专业课，好些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些近代文学资料和论著的专辑，报刊上探讨近代文学的文章也较多了。为迎接这个已经躁动的研究势头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特以作家作品为主，编选出版《中国近代文学丛书》，分别介绍各派各家及其代表作品，使读者对近代文学作品的概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，也为进一步研究近代文学提供了不少方便，这对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和近代文化思潮都是极有意义的事。

在中国历史上，完整的近代概念，虽然是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49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。但是，这套丛书编介的作家和作品，仍以习称的“五四”前八十年的近代为范围，这也因为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至“五四”才发生哲学概念上的

质变，才由古典文学正式跨进现代新文学的行列，它的这个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的，比“五四”时期别的领域更显著。然而它不是拔地突起的孤峰，乃是由岗峦起伏的山脉逶迤驰来，我们考察一下“五四”前文学领域发生的变嬗，即可看出由岗峦到高峰的脉络。

一、鸦片战后的四十年，中国对科学技术已有明显的追求，对政治、教育也渐有新的憧憬，而文学这个领域却很少触动，仍是汉魏辞赋、唐宋诗文。作为古代殿军、近代文学起头的龚自珍，除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后人外，从他那里还嗅不出什么时代气息。随后出现的冯桂芬《校邠庐抗议》、王韬《弢园文录》一类书，其中虽不乏文字优美的篇章，但并没有超越《论衡》、《潜书》那种论著的格局。惟有值得庆幸的是，他们的眼界已朦胧初开，世界景物，海外风云已星星点点地洒落在他们的笔下；他们也发出了为文“称心而言，不必有义法”（冯桂芬语）的呼声，或“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，自抒胸意，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，斯即佳文。”（王韬语）

二、到甲午战争前后的岁月里，经历西学的传播和战争的惨败，迫使人们做出较大的反应。一批慷慨谈天下事的知识分子，开始警悟到士人徒以诗文鸣高无补于亟变的世务。无补于民族的安危。对之渐作贬斥了。康有为说“士知文而不通中外”，徒然“苟且粉饰”；严复说应“先物理而后文词，重达用而薄藻饰”；谭嗣同更在其诗集自叙中说：“天发杀机，龙蛇起陆，犹不自惩，而为此无用之呻吟，抑何靡与？三十年之精力散于考据词章，垂垂尽矣，勉于世，无一当焉。”这是在痛怨科场试文的同时，进而对徒作“无用之呻吟”的古典诗文的反省，是推动文学改革的信号。由此恣肆通畅的报刊文章通行

起来，改良诗学的“诗界革命”也登场了，出现了一批在政治上要求变革、在文学上有所创新的士人。康有为是个头儿，而“笔锋所至不受检束”的梁启超时务文，“足遍五洲多异想”的黄遵宪爱国史诗，则最富代表性。他们虽然仍未脱古文古诗的窠臼，但俚言译语，中西人物，古今思想，信手拈来，皆入诗文，在旧的形式中装进了新的词汇与内容。正如前此龚自珍所说：“外境迭至，如风吹水，万态皆有，皆成文章，水何拒之哉！”这就造成了一代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过渡形态文学，即日后盛称的“旧瓶装新酒”。那时饱受西方教育的严复，他译述《天演论》等书，也还是要把西方的新意境纳入汉魏文章的风格中，让人能象诵读汉魏文章那样去诵读。

三、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年，知识界的视野扩大了，新意境增多了，继“诗界革命”之后，而有“戏剧革命”、“小说界革命”、“文界革命”，它们已不止是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延伸，而是新意境已在冲击旧风格的墙壁，大量报刊和译著日益发生这种作用，其中又以对小说、戏剧的新认识和发行白话报更具有这种势头。一向被鄙视的小说，在正宗文学里没有它的地位，自1897年天津《国闻报》发表《本报附印说部缘起》，特别是1902年梁启超创刊《新小说》杂志并刊出他的《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》，指出小说对政治、社会的重大作用，小说开始同正宗文学的散文、诗词并称了。尽管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及其他社会小说没有突破旧的章回体，但所涉及的内容和描述的手法，无疑受到了西方文艺的影响，以及对小说的价值观的变化，都在动摇旧风格。戏剧方面，不仅以旧形式演时事新戏，而且出现了与旧形式完全不同的新品种——话剧。为了开民智，为了宣传革新，自1897年裘廷梁发出了“白话为维新之本”的呼声之后，1901年《杭州白话报》、《苏州白话报》、《京话

报》问世，相继创刊了十余种白话报，打破了报刊一律文言文的旧形式。这种报刊白话文不是富有审美观的文学语言，但它是现代文学的基石，不久，新文化运动揭出的“文学革命”旗帜，就是以白话文为前导的。

近代文学的短暂历程，是接受西方文学的挑战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化过程中推向现代的，其特征是变，新陈代谢的变。1902年，蔡元培选录“当世名士著译之文”，间取“于新意无忤”的先哲遗作，辑为一书，题名《文变》。他在序言中说：“自唐以来，有所谓古文专集，繁矣。拔其尤而为纂录，评选之本亦不鲜。自今观之，其所谓体格，所谓义法，纠缠束缚，徒便摹拟，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。”可见他的这个选本，不是《昭明文选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、《经史百家杂抄》的续编，乃是《诗经》、《左传》两千数百年以来的“文变”。

“文变”，变了什么？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它的主要特征。新意境是随同外境的变迁而来，受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引导，以新闻新义反映民主进步意识，有的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译作，有的是直接观察所得，由此对残暴、欺诈、腐败、愚昧种种社会现象的揭露，除了那些以讽刺谴责著称的小说和龚自珍、金和等人的诗文外，其他千百种近代人的诗文集和杂著都不无这样的篇什。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大量爱国作品，从张维屏的《三元里》数起，有许多是既富民族激情也很有时代色泽的杰作。新意境的积累不会只满足于旧风格的容纳，势必触动旧风格，梁启超的不受绳墨的新文体，黄遵宪的“我手写我口”的创格诗，王国维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意境、境界说，海派文化带来的艺术新风，不能说不是随着新意境在风格上产生的微变。

这种变嬗中的近代文学，可以从中看到时代的步伐，是近

代文学的主流。梁启超曾说那个时候，他们“冥思苦索，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，即中即西之新学派”。当然在文学上也逃不出这种“不中不西、即中即西”的状态，就时代的跨度来说，也可以说是一种“不古不今、即古即今”的文学，所以我喜欢用“学问不中不西、文章半今半古”来概括他们的风貌，这似乎是从龙钟的古典文学进到活泼的现代文学的必经阶梯。“不中不西”、“半今半古”是就“文变”的迹象而言，必然还有不变者存在，那就是固守樊篱的古文派，它们既有在嘉庆时已中衰经梅伯言、曾国藩的提倡自道光后又振兴的桐城派，而曾国藩为文主气势，得友徒的烘托，更被称为入乎桐城又出乎桐城的湘乡派；也有由祁寯藻、程恩泽等对宋诗的推崇，进而衍为陈三立、陈衍、郑孝胥一派入宗宋诗的同光体；还有言必称汉魏的王闿运，所作湘绮楼诗文皆古色斑斓，这些文派、诗派，或拘守性理义法，或生涩模仿，已背离时代，近于僵化，但也不能一笔抹煞，他们席古典文学的余荫，运用成熟的技巧，不是完全没有锤炼出可取的作品来。因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与欣赏常会超越而存在。

在新文体与古文学的角逐中，反映了新旧两种观念在文学上的差异，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新旧进退。如早年即立志革命又能博采西学的章太炎，他以渊博的学问，条达的理论，发而为凝炼精深的文章，即其论学著作有的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，应该说是近代的古典文学巨匠，他却以文章“有其利而无其病者，莫若魏晋”（《国故论衡》）；刻意摹拟魏晋，采辟词，用古字，成为他的癖好。终因远离生活，他的学问大有传人，而其文章已无嗣响。又如南社是著名的民族革命文学组织，成员大多兼有同盟会会籍，宣传反清，宣传民主，影响遍及东南各省，而其文学实践却是比较保守的。展视二十二集《南

社丛刻》所录诗词和散文，虽不乏佳作，但对艺术的创新，找不到黄遵宪那样的诗人，也没有梁启超那样的笔锋。作为西社巨子的柳亚子，无疑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家，他留下了七八千首古体诗词，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，但从风格上说，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突破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结束了近代文学的历程，它是以“文学革命”为号角的，对先前的“诗界革命”、“小说界革命”、“戏剧革命”、“文界革命”和白话报的局部改良是个伟大发展：一、宣布一切文言文是死文学，白话文学是活文学，要求从文学的基石——语言文字开始的全变革，造成国语的文学；二、摒弃一切脱离生活的古典文学，提倡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。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成为总的趋势，在“五四”前夕1917、1918年已展示出来，从此进入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时代。近代的“文变”则是进入这个时代的引桥。我们编辑这套丛书，也是企望它能成为研究近代文学和认识近代社会的引桥。

陈旭麓

1987年6月于华东师范大学

一代爱国志士 诗界革命巨子

—

近代台籍爱国人士、著名诗人丘逢甲，字仙根，号蛰仙，又号仲阏，诗人常署仓海君，及民国成立，即以仓海为名，诗文又别署南武山人。生于同治三年(1864)，卒于民国元年(1912)。其祖籍河南商丘，南宋末年迁入福州上杭。后因其二世祖创兆随文天祥抗元，复迁入广东梅州员山(今梅县蕉岭文福乡)。至其曾祖，始迁台湾。

丘逢甲的祖父丘学祥、父亲丘龙章皆以诗书起家，且“锄强扶弱，有任侠风”^①。家庭中浓烈的书香之气和任侠之风，对丘逢甲的影响和濡染是很深的。他三岁时就跟父亲读书，聪颖异常，有“神童”之目。五岁能属对、吟诗，六岁能文章。十三岁中秀才。试古学，全台第一。当时台湾巡抚丁日昌，因为丘逢甲年纪最小，交卷又最早，所以特别要求他另作全台竹枝词百首，他一日即成，丁甚为惊讶，特赠“东宁才子”印一方。

鸦片战争以后，台湾倍受列强的垂涎，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大肆侵略和渗透，固然有其破坏性的一面，但同时也在无形中促成了台湾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和发展。当时的洋务派，面对敌强我弱、敌盛我衰的现状，决心“师夷长技以自强”。

① 丘琮《仓海先生丘逢甲年谱》(以下简称《年谱》)。

清政府派驻台湾的第一任巡抚刘铭强，作为洋务派的得力干将，他在任职的6年时间里，“筹行邮传，增电线，筑铁路。……兴殖产，劝工商，铸新币，创西学堂”^①，使台湾较多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影响，各方面的面貌大为改观。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，促使了年轻的丘逢甲力图探索一条强国富民的新路。他潜心西学，于书无所不读，“译书素浏览，兼习中西事”^②。光绪十年(1884)，中法战争爆发，台湾首当其冲，二十一岁的丘逢甲，忧心如焚，深感国家民族之患，无时不在关注着局势的变化和发展，同时更加留意中外时事，西方文化，“慨然有维新之志”^③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)，逢甲26岁，赴北京参加己丑年会试，中式八十一名进士，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，但“到署未几，厌之”^④，即告假回台省亲，此后一直未赴任。在清末大多数士大夫汲汲于功名的当时，逢甲却无意仕途，这件事本身说明，他对清廷的腐败，国家的危境，已有所体察，其谓“闻道昭王此筑台，依然悬格待奇才。年年车马燕山道，不为黄金客不来”(《黄金台》)。他认为，国家图强的良策在于，通过办教育，宣扬传播西方新思潮，唤醒国民，培养有用之才，这是当务之急。因此，在回台后的几年中，逢甲孜孜于讲学，先后主讲台中府衡文书院、台南府罗山书院、嘉义县崇文书院。在讲学时，除应试文艺外，“兼讲中外史实”，劝导学生多读报，“以广见闻”^⑤。这对开通台湾民智是起了一定作用的。他晚年如此热心于教务，与这一时期的思想密切相关。

迨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，清军溃败，沿海防务更无保

① 连横《台湾通史》卷三十三《刘铭传列传》。

②④ 丘逢甲《年谱拾遗》。

③⑤ 丘逢甲《年谱》。

障。丘逢甲深知，台湾一岛，地势冲要，不仅是祖国的南大门，而且也是吕宋、琉球的篱藩，日人覬觐已久，迄未到手，这次定会以战胜之威倾全力来争。于是，他预先策划，请命台湾巡抚唐景崧，愿率士民共同守御。在缺械、缺饷以及清王朝官僚、军队间矛盾重重，相互牵制，相互割据，以至相互火并的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情况下，丘逢甲率领亲自组织起来的台湾义军，和家乡男女老少一起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殊死战斗。可是，蝇营狗苟的清王朝不思抗日，反而与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割让台湾、澎湖诸岛。凶讯传来，举国大哗，台民更是“若午夜暴闻轰雷，惊骇无人色，奔走相告，聚哭于市中，夜以继日，哭声达于四野”^①。丘逢甲也悲愤激，痛哭曰：“清廷虽弃我，我岂可复自弃耶。”^②于是，一面驰电上书朝廷，慷慨陈词，反对割台，一面继续率义军抗寇卫土。新竹一役，所率义军，终因孤立无援，饷绝弹尽，死伤过重而失败。丘逢甲怀着“孤臣无力可回天”（《离台诗》）的遗恨，于1895年“痛哭辞故国”内渡。

诚然，内渡之初，丘逢甲的脑际曾闪动过“奉亲且作渔樵隐，到处名山可挂单”的情绪，并且驰心山水，借酒消愁，“欲觅山林寄此身”，“古松阴里好盘桓”（《寻镇山楼故址因登城四眺越日遂游城北渚山》），“补天填海都无益，空洒东风泪满巾”（《村居书感次崧甫韵》），迷惘、怅然，无以自己。但对于一个在少年时期就怀抱着献身祖国的雄心大志，期望着“夜夜龙光射斗牛”的人来说，那只不过是暗涌表面的一丝涟漪而已。“名驹未悔困鞿鞍，鸷鸟何曾惜羽翰。人到穷愁思著述，天留豪杰济艰难。衣冠文武浮云变，雷雨蛟龙大海宽。不信平生飞动

① 《小说月报》六卷3号。

② 丘琮《丘仓海传》。

意，但将文字救饥寒”(《秋怀》)这才是他真正的心迹所在。虽然一时“穷愁”索居，埋首著述，但却期待着隐藏于内心的“蛟龙”有朝一日能在宽阔的大海中尽情翻腾。可见，他的爱国之情没有消失，爱国之志也没有泯灭。他是身隐心不隐，身在“名山”，心在尘世的。

因此，他才“夜夜梦台湾”(《往事》)，在梦寐里也不忘收复故土，伸雪国家民族的耻辱，殷切寄语台湾父老乡亲“须记汉官仪”，并发誓“十年如未死，卷土定重来”(《送颂臣之台湾》之六)，“相期亚陆风云再相见，骑鲸东海来挽神州沉”(《送谢四东归》)。

当康有为等人掀起一场改良主义运动时，丘逢甲又以诗歌为武器为改良运动大声疾呼。他祷祝“欲张挞伐，以湔国耻”^①的光绪帝能早日亲政，发奋为雄，重振朝纲：“麟笔书春后，将铭绝世功。驰书谕殊域，草檄下群雄。沧海波全定，神州日再中。东西朔南暨，齐颂黑头公。”(《试笔》)；而直斥慈禧的越权干政，苟且误国：“天鸡不能雄，牝鸡代为鸣。”(《杂诗》其三)应当指出，丘逢甲这种把变革成功的期望寄托于帝王的幻想，正反映了改良派政治上的双重性：即一方面具有变法图强、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性质，另一方面具有维护封建政权的性质。当然，这在当时是不足深责的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“戊戌变法”失败之后、一时乌云密布的情况下，逢甲没有气馁，更没有消沉，而以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，敏锐的政治目光，清醒地意识到，社会弊病根深蒂固，摧之不易；变革图强，“要展回天策”，决非轻而易举，必须经过“千盘百折”(《韩江有感》)的不懈努力和浴血奋斗。更令他振奋的是，从那些变革志士的

① 《清史稿》卷二十四《德宗本纪》。